

英国穆斯林族群探究：移民历史、 代际差异与社会影响

• 马启峰*

[内容提要] 英国穆斯林族群是欧洲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组成，其历史演进、代际差异与社会影响，构成了观察欧洲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的典型视角。本文以历史社会学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该群体自前现代商贸往来至 21 世纪难民潮的英国移民史，揭示其从“近代殖民附庸”到“战后廉价劳动力”再到“重要少数族群”的转型脉络。对于代际差异，英国穆斯林群体的战后三代人呈现出从防御性融合到动态解构再到创新重构的身份演变路径，为理解其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博弈提供了历时性视角。社会影响方面，该族群的经济贡献与政治赋权未能消解制度性排斥的持续压迫，脱欧后的主权叙事重构与保守党的持续右转，加剧了英国穆斯林族群宗教身份与公民身份间的张

* 本文系 2025 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公投视角下英国民主赤字反思及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025lzujbkyqk017）的阶段性成果。

力，迫使该群体在甚嚣尘上的“伊斯兰恐惧症”社会背景中探索新的生存策略。英国穆斯林族群的发展是全球化时代“主权—人权”冲突与“传统—现代”博弈的缩影，其前景取决于英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包容性治理以及族群内部现代化思想对民族传统的革新。

[关键词] 英国穆斯林 移民历史 代际差异 社会影响 身份认同

英国穆斯林移民群体的百年变迁，既是观察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的典型样本，也映射着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困境。自前现代时期穆斯林商人随殖民贸易踏上英伦三岛以来，这一群体历经三次结构性移民浪潮：二战后南亚劳工填补工业空缺，20世纪70年代非洲殖民地独立催生的家庭团聚潮，以及21世纪中东战乱推动的难民涌入。据《世界人口评论》统计，2025年英国穆斯林人口将突破380万（占总人口的5.8%），其中伦敦拥有逾130万穆斯林，占比达15%。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已是英国第二大宗教。^①

穆斯林社群的壮大重塑了社会文化版图，却也因外来性而使自身陷入了经济边缘化、政治疏离以及代际价值观冲突等生存困境，而其中“英国公民”与“穆斯林身份”的认同撕裂始终如影随形。“9·11”事件后，反恐话语令穆斯林群

^①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Muslim Population by Country 2025,”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muslim-population-by-country>; The Cloaked Council, “Percentage of Muslims in the UK in 2024: The Growing Presence of Muslims in Politics,” *The British Tribune*, September 1, 2024, <https://thebritishtribune.com/2024/09/01/percentage-of-muslims-in-the-uk-in-2024/>（上网时间：2025年3月3日）。

体陷入严密的制度审查网络，而 2011 年欧洲难民危机更是加速了英国移民政策的紧缩，该群体遭遇的社会排斥骤增。2016 年脱欧公投则将移民问题与主权叙事捆绑，民粹势力借“夺回控制权”口号煽动本土主义，将经济焦虑转化为对穆斯林社群的抹黑。当英国国家认同被强制重构为“公民忠诚高于宗教属性”，多元共存理想让位于单一民族主义想象，穆斯林族群不得不在安全审查、福利削减与文化敌意中寻找生存缝隙。

本文将从移民历史、代际差异与社会影响三个维度切入，剖析全球化背景下的主权与人权张力，以及文化与制度冲突是如何塑造英国穆斯林当代境遇的。研究认为，破除这一困局不能止步于政策修补，而需要在资源分配、话语更新与文化治理层面实现多维度协同。这既是对英国社会包容性的检验，更是对全球化时代少数族裔生存策略的探讨。

一、英国穆斯林族群的历史发展

（一）前现代时期的跨文明互动与殖民时期的族群雏形

20 世纪之前的英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前现代早期接触与互动，以及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殖民时代的移民与族群形成。从公元 7 世纪穆斯林征服埃及、巴勒斯坦开始，英国西部的凯尔特人便通过地中海贸易与穆斯林世界产生联系。^① 考古证据如 8 世纪苏格兰达里亚达王国的穆斯

^① Daoud Rosser - Owen,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the British Isles: An Overview," *The Association For British Muslims*, 1998, https://members.tripod.com/~british_muslims_assn/history_of_islam_in_the_bi.html (上网时间: 2025 年 3 月 5 日)。

林国王塞尔巴赫及其臣民的存在,^① 775 年麦西亚国王奥法铸造的仿阿拉伯金币,^② 以及 9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不列颠地名的记载,^③ 均表明穆斯林商人、旅行者乃至定居者早已踏上英伦三岛。

中世纪时期,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13 世纪英格兰国王约翰曾试图与摩洛哥联姻并愿为政治利益改信伊斯兰教。^④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6 世纪末)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摩洛哥建立了战略同盟。^⑤ 尤其是 1596 年英军解放了西班牙船只上的穆斯林奴隶并护送他们返回北非,该事件既表明了英国借重伊斯兰势力来对抗天主教西班牙,更折射出当时穆斯林在英国社会的受重视程度。^⑥ 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同样深远——牛津^⑦、剑桥^⑧设立阿拉伯语教席、伊本·西那的医学著作成为英国教材,^⑨ 都显示

① Daoud Rosser – Owen,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the British Isles: An Overview”, *The Association For British Muslims*, 1998, https://members.tripod.com/~british_muslims_assn/history_of_islam_in_the_bi.html (上网时间: 2025 年 3 月 5 日)。

② Rory Naismith, “Islamic Coins from Early Medieval England,” in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1966 –), Vol. 165 (2005), pp. 193 – 222。

③ Syah Budi, “Akar Historis dan Perkembangan Islam di Inggris,” in *Tasamuh: Jurnal Studi Islam*, Vol. 10, No. 2 (2018), p. 325。

④ Farrukh I. Younus, “1000 years of Islam in Britain,” *IslamAwareness*, December 6, 2005, <https://www.islamawareness.net/Europe/UK/1000years.html> (上网时间: 2025 年 3 月 8 日)。

⑤ Samia Errazzouki, “Partners in empire: Sultan Ahmad al – Mansur and Queen Elizabeth I”, in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8, No. 3 (2023), pp. 501 – 518。

⑥ Nabil Matar, *Turks, Moors, and Englishmen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0。

⑦ University of Oxford, “History of the Faculty,” <https://www.ames.ox.ac.uk/history-faculty-1> (上网时间: 2025 年 3 月 10 日)。

⑧ Robin Bidwell,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Bulletin*, Vol. 1, No. 2 (1975), p. 84。

⑨ Rachel Hajar MD, “The Air of History (Part V) Ibn Sina (Avicenna): The Great Physician and Philosopher,” in *Heart Views*, Vol. 14, No. 4 (2012), p. 196。

出伊斯兰文明对英国知识体系的渗透。尽管 17 世纪詹姆斯一世的联西抗奥政策导致英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降温,但数百年间通过贸易、外交、宗教与知识传播形成的互动网络,已为双方关系奠定了复杂而多元的基础。

19 世纪英国的殖民扩张推动了穆斯林世界与帝国中心产生新形态的联系。英国对印度、马来半岛等穆斯林聚居区施行控制,而来自也门、索马里、孟加拉的船员与劳工也开始定居英国港口城市,形成了卡迪夫(以也门移民为主)和利物浦(本土皈依者主导)的早期穆斯林族群。^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曼岛律师威廉·奎里亚姆。此人在摩洛哥皈依伊斯兰教后,于 1887 年创立英国伊斯兰协会,并被奥斯曼哈里发任命为不列颠群岛的“谢赫伊斯兰”。^② 此举甚至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默许。^③ 这一时期的穆斯林群体呈现出双重特征,既有本土精英的宗教改宗,也有殖民体系下底层移民的族群建设。尽管彼时穆斯林人口规模仍较小,但他们已嵌入英国社会,例如,也门水手会与本地人通婚,政治精英皈依者也会参与帝国治理,而穆斯林文化遗产也通过建筑(首座清真寺)^④ 与学术(东方学研究)被部分吸纳。这种关系既延续了前现代商贸与知识交流的传统,又在殖民权力不对等的

① Sophie Gilliat-Ray, “‘The first registered mosque in the UK, Cardiff, 1860’: the evolution of a myth,” in *Contemporary Islam*, Vol. 4, No. 2 (2010), p. 179.

② 伊斯兰世界中对伊斯兰知识优秀学者的敬称。在 1924 年哈里发制废除前,是指奥斯曼帝国地方宗教长老这一官职。参见 Britannica, “Shaykh al-Islām”,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haykh-al-islam>. (上网时间: 2025 年 4 月 10 日)

③ BBC, “The British Victorians who became Muslims”, May 19, 2019,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48069763> (上网时间: 2025 年 3 月 15 日)。

④ The Guardian, “From Scholarship, Sailors and Sects to the Mills and the Mosques,” June 18, 20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2002/jun/18/september11.religion> (上网时间: 2025 年 3 月 15 日)。

背景下孕育出新的张力，为 20 世纪后英国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埋下伏笔。

（二）战后劳动力的输入与族群转型

二战后英国穆斯林族群的形成可划分为两个相互交织的阶段，其发展轨迹既受殖民遗产与经济需求的驱动，也始终伴随着政策调控下的身份重构。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为填补战后重建的劳动力缺口，通过《1948 年英国国籍法》赋予英联邦公民移民权，由此开启了以巴基斯坦（含今孟加拉国）、印度旁遮普地区为主的移民潮。^① 这些移民中既有因印巴分治动荡失去家园的农民，也有受曼格拉水坝工程^②影响的流离失所者，其中具有英国军旅背景的群体凭借殖民纽带得以率先迁入。^③ 1950—1962 年，近 50 万名新英联邦移民涌入英国本土，其中巴基斯坦移民就超过了 6 万人，形成以单身男性为主的早期族群。^④ 这些移民多聚集在工业城市，从事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底层工作，虽然居住环境拥挤，但他们的同乡关系催生了紧密的社区网络。然而，这一进程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

① Sarah Ansari, “Subjects or Citizens? India, Pakistan and the 1948 British Nationality Act”, in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42, No. 2 (2023), pp. 285–312.

② 巴基斯坦的米尔布尔和达迪亚尔地区因曼格拉大坝修建导致超过 11 万人流离失所，大量居民通过巴基斯坦政府颁发的英国工作许可迁入英国。参见 Abdul Hadi, “Dams and Displacement in Turkey and Pakistan,” in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 3, No. 2 (2017), p. 244.

③ Jonas Otterbeck and Jørgen S. Nielsen, *Muslims in Western Eur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44.

④ Andrew Thompson, “How has Britain’s Post – War Experience of Immigration Shaped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on Integration?”, *COMPAS*, October 20, 2014, <https://www.compas.ox.ac.uk/publication/how-has-britains-post-war-experience-of-immigration-shaped-the-contemporary-debate-on-integration>（上网时间：2025 年 3 月 15 日）。

了转变。

1962年,英国政府颁布《英联邦移民法》,该法案对非技术移民的准入资格进行了限制。不过,为了避免社会动乱,该法案仍为普通外国劳工提供了18个月的缓冲期,他们需要在此期间做出是否永久居留的决定。该法案同时也默许亲属担保形成的链式移民,目的就是让英国的劳动力空缺得到持续填补。^①当1964年英国彻底禁止非技术移民后,原先持“过客心态”的单身男性开始购置房产接来家属。布拉德福德的曼宁汉姆等区域在此背景下演变为家庭聚居的穆斯林街区。^②不过,对于少数族群,英国社会始终存在政策设计层面的隐性筛选机制,即政府既依赖移民填补岗位,又通过住房隔离与福利限制来维持其“临时工”的身份。当然,移民群体也在主动改变生存策略来对抗这种限制的影响。早期省吃俭用寄钱回乡的劳工,逐渐转变为经营清真肉铺、杂货店的定居者。他们的个人信仰也开始拓展为包含宗教教育、节庆仪式的公共生活体系。这种转变既源于南亚农村经济依附性所升高的外迁压力,也源于英国工业城市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从殖民时期的军政联系,到战后经济链条的重组,穆斯林族群最终在政策与生存的双重压力下,完成了从外来劳工暂居地向文化自治空间的转型。

(三) 多元化移民浪潮与族群重构

20世纪70年代后,中东冲突和东非去殖民化运动引发的第

^① Kenneth. R. Simmonds, “Immigration Control and the Free Movement of Labour: A Problem of Harmon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21, No. 2 (1972), p. 309.

^② Charles Husband et al., *Lived Diversities: Space, Place and Identities in the Multi-Ethnic City*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4), p. 19.

二次移民潮进一步丰富了英国穆斯林族群结构。肯尼亚、乌干达推行的“非洲化”政策迫使大量亚裔商人携英籍身份迁入英国。这些拥有较高教育水平与商业经验的移民迅速填补了零售与服务业缺口，并在莱斯特、伦敦形成新聚居区。^① 这些新移民与南亚工人在阶级、语言和教派上存在差异，前者多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后者则以蓝领为主。族群内部也因此形成了多元文化景观，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则成为协调差异、构建共同身份的重要空间。至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穆斯林群体已从分散的劳工族群发展为拥有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稳定少数族裔，家庭团聚使族群性别比例趋于平衡。彼时，英国穆斯林人口已突破百万，而冷战后的地缘政治动荡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族群的多样性特征。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例如，1992 年的波黑战争和 1998 年的科索沃战争，促使数万名穆斯林难民迁入英国。^② 进入 21 世纪，中东变局以及伊拉克战争（2003）、叙利亚内战（2011）等冲突，推动新一轮难民潮。截至 2021 年，英国已为超过 3 万名叙利亚难民提供庇护。^③

21 世纪前两个十年的移民潮加速了英国穆斯林族群的多元化与内部裂变。南亚裔通过代际教育跃升实现阶层流动，第三代巴基斯坦裔大学入学率达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并涌现出如萨迪克·汗（2016 年当选伦敦市市长）等巴基斯坦裔的

① Alison Shaw,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K,” in Jacqueline Scott et al.,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Sociology of Famil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 270.

② Vaughan Robinson and Caroline Coleman, “Lessons learned?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Government Program to Resettle Bosnian Quota Refuge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4, No. 4 (2000), pp. 1217–1244.

③ Becky Morton and Mark Easton, “UK pauses decisions on Syrian asylum claims,” *BBC News*, December 10,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36e0d0xw1ro> (上网时间 2025 年 3 月 28 日)。

政治精英。^① 而非洲与中东新移民受语言障碍与学历认证限制，仍集中于低端服务业，如出租车司机、清洁工等岗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虽在法律层面保障宗教平等，但 2005 年伦敦地铁爆炸案、2017 年曼彻斯特恐袭案、2024 年南港骚乱等事件无疑加剧了社会对立，促使英国政府强化宗教监管。这种包容与安全的二元政策，既折射出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的复杂性，也暴露出殖民遗产与现实治理的不和谐。

二、英国穆斯林族群的代际差异

（一）原生文化与宗教实践的防御性融合

英国穆斯林族群的身份建构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这一差异根植于移民群体及其后裔在不同社会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与身份协调。第一代移民的初级社会化发生于原籍国的宗教与民族文化语境中，其身份认同与南亚或中东地区的传统密不可分；而第二代及之后的英国本土穆斯林则在双重社会化张力中成长，他们既受家庭传承的宗教文化塑造，又需直面英国主流社会的集体意识影响。这种代际差异不仅体现在宗教实践的形式上，更反映于语言、饮食、服饰等文化符号上。他们的身份认同经历着族群宗教与宗教国家的撕扯。

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是原生文化与宗教实践的高度融合。根据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的社会化理论，英国穆斯林在原籍国的初级社会化将宗教价值观与南亚或中东的

^① Robert Booth, "Labour's Sadiq Khan elected mayor of London," *The Guardian*, May 7,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6/may/07/sadiq-khan-elected-mayor-of-london-labour> (上网时间 2025 年 3 月 28 日)。

族群文化直接嵌入自我认知。^① 例如，第一代巴基斯坦移民将“礼拜”与“手抓饭”视为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并通过建立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在英国复刻原乡生活方式。^② 宣教团体的案例尤为典型，其定期举办的清真寺外出宣教通过集体诵经、传统饮食和南亚式社交，为移民提供了抵御文化疏离的庇护。^③ 这种身份建构具有强烈的防御性，既是对英国主流文化陌生感的回应，也是对归乡希望破灭后的心理补偿。然而，这种固化的族群宗教认同在代际传递中面临挑战。斯库菲尔德等的研究发现，初代移民对子女的穆斯林族群意识的培养包含以下几点：以教义学习来增强认知、以命名仪式来强化实践、以宗教学校来巩固社群网络；但是面对年轻的穆斯林群体，英国社会的次级社会化力量，如学校教育、媒体影响以及非穆斯林裔的同辈的影响，逐渐稀释了单一文化叙事的权威性，成为代际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④

（二）双重社会化中的身份解构与重构

英国本土出生的第二代穆斯林在身份建构上呈现出矛盾性。他们既继承父辈的宗教遗产，又需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重新定义“英国性”与“伊斯兰性”的关系。与第一代不同，他们的初级社会化虽受家庭宗教文化影响，但其民族观早已被英国语言、

①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6)。

② Riyaz Timol, “Ethno – religious Socialisation,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Muslim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Islam*, Vol. 14, No. 3 (2020), p. 336。

③ Peter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pp. 45 – 51。

④ 参见上引 Riyaz Timol, “Ethno – religious Socialisation,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Muslim Identity,” pp. 336 – 340。

教育和社会规范渗透。这种双重社会化导致身份认同的碎片化。例如,年轻穆斯林普遍掌握英语而非祖辈语言,并且偏好“英式茶”而非“南亚奶茶”。^①他们在宗教实践中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研究认为,第二代穆斯林更倾向于将宗教实践与族群传统解绑,通过“内部改宗”来重构个人信仰——他们可能身着西式服装参与传教,或在社交媒体传播伊斯兰知识,将集体崇拜转化为个人追求。^②这种选择性的传统主义也正好印证了宗教学者润·吉夫提出的穆斯林认同的三元理论,即年轻一代一直试图在族群、国籍和宗教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③此外,英国政府在中小学推动的“基本英国价值观”教育^④进一步催化了第二代英国穆斯林裔族群认同的异化过程。这种异化的本质就是涂尔干提出的社会黏合剂策略——以公民身份弥合文化裂隙。^⑤

(三) 全球化时代的动态身份

英国穆斯林的身份演变并非线性同化,而是代际间持续的文化协商与意义再生产。第三代穆斯林的身份更趋多元。一方

① 参见上引 Riyaz Timol, “Ethno – religious Socialisation,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Muslim Identity,” p. 343。

② Riyaz Timol, “Ethno – religious Socialisation,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Muslim Identity,” p. 346。

③ Ron Geaves, *Sectarian Influences within Islam in Britain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cepts of ‘ummah’ an ‘community’* (Leeds: University of Leeds, 1996)。

④ 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独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都“有责任”积极弘扬“民主、法治、个人自由以及对不同信仰与信念的相互尊重与包容等基本英国价值观”。参见 UK Government, “Guidance on Promoting British Values in Schools Published,” November 27, 201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uidance-on-promoting-british-values-in-schools-published> (上网时间:2025年4月2日)。

⑤ 参见上引 Riyaz Timol, “Ethno – religious Socialisation,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Muslim Identity,” p. 334。

面，全球化与数字技术加速宗教实践的个体化，年轻穆斯林通过跨国网络接触多元伊斯兰思潮，例如，伊斯兰女性主义、^① 伊斯兰环保主义，^② 族群传统的垄断性在此背景下遭到削弱；另一方面，英国社会的世俗化与宗教边缘化反向强化宗教作为身份锚点的功能。第三代穆斯林家庭更注重宗教教育的情感纽带作用，通过亲子互动（如共同礼拜）而非权威灌输来传递信仰。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儿子想要忘记的，正是孙子想要记住的”^③。这种转变显示，宗教认同逐渐从族群附属品转化为个人选择，并与公民身份形成新的兼容模式。也就是说，年轻穆斯林可能同时支持体现英国价值观的性少数权利，也会坚守体现宗教认同的礼拜义务。当然，这种动态平衡仍受限制。种族歧视、移民政策的持续收紧以及全球范围内攀升的伊斯兰恐惧症，迫使英国穆斯林族群需不断审视“我们”与“他们”的边界。夸梅·吉耶克认为，国家建构在此时便能突出解释这一现象，即当主流社

① 伊斯兰女性主义主张通过重新诠释《古兰经》与圣训，在宗教框架内解构父权制话语，强调正义与平等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原则，并致力于恢复早期伊斯兰对女性教育、权利及领导地位的认可（如女性担任伊玛目）。其核心并非反对信仰，而是批判文化习俗对宗教的扭曲，推动女性在信仰与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参见 Valentine M. Moghadam, “Islamic Femi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oward a Resolution of the Debate,” in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7 No. 4 (2002), pp. 1135–1171; Fatima Seedat, “Islam, Feminism, and Islamic Feminism: Between Inadequacy and Inevitability,” in *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 Vol. 29, No. 2 (2013), pp. 25–45。

② 伊斯兰环保主义根植于《古兰经》与圣训的生态伦理，强调人类作为自然守护者的责任，主张通过节制、平衡及对神圣创造物的敬畏，将环保实践融入信仰核心。这一理念批判现代性对自然的商品化，呼吁以信仰为纽带重建人与环境的共生关系，使环保行动成为穆斯林践行信仰的内在自觉。参见 Richard Foltz, “Is there an Islamic Environmentalism?”,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22, No. 1 (2000), pp. 63–72; MD Saidul Islam, “Old philosophy, New Movement: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Ecological Paradigm in the Discourse of Environmentalism”, in *Nature and Culture*, Vol. 7, No. 1 (2012), pp. 72–94。

③ 参见上引 Riyaz Timol, “Ethno-religious Socialisation,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Muslim Identity,” p. 348。

会试图以“英国性”统合多元群体时，穆斯林青年的身份实践既是对国家叙事的参与，亦是对其局限性的批判性回应。^①

三、英国穆斯林族群的社会影响

（一）经济推力与制度阻力

英国穆斯林族群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涵盖劳动力市场、企业经营、慈善事业以及特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尽管这一群体在主流叙事中常被边缘化，但数据显示，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中，英国穆斯林对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的贡献尤为突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医生响应政府号召，成为NHS重建的中坚力量。截至2024年，英格兰地区就有4.6万名穆斯林在NHS体系内工作。^②在医生等专业技术性强的岗位中，穆斯林占比达到了10%。^③此外，穆斯林在验光师（20%）、^④药剂师（16.7%）、^⑤

① Kwame Gyeky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frican Exper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5.

② Edd Church, “What it's Like to be Visibly Muslim in the NHS”, *Nursing Times*, May 2, 2024, <https://www.nursingtimes.net/workforce/what-its-like-to-be-visibly-muslim-in-the-nhs-02-05-2024/> (上网时间: 2025年4月7日)。

③ Aisha Rimi, “44% of Muslim Doctors ‘have Faced Regular Discrimination Since Medical School’”, *Hyphen*, December 23, 2024, <https://hyphenonline.com/2024/12/23/44-of-muslim-doctors-have-faced-regular-discrimination-since-medical-school/> (上网时间: 2025年4月10日)。

④ General Optical Council, “EDI Annual Report 2023”, <https://optical.org/media/jyofxcm3/edi-annual-report-second-version-2022-23.pdf> (上网时间: 2025年4月11日)。

⑤ General Pharmaceutical Council, “The GPhC Register as of 30 September 2023 - Diversity data Tables”, <https://assets.pharmacyregulation.org/files/2024-01/gphc-all-register-diversity-data-september-2023.docx>, (上网时间: 2025年4月13日)。

牙医 (12.5%)、^① 生物医学科学家 (10%)^② 等关键岗位中的占比显著高于人口比例 (英国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 6.5%)。这些数据表明, 穆斯林群体不仅是医疗体系的重要支撑, 更填补了英国高技能劳动力的缺口。在交通领域, 穆斯林群体同样贡献突出。伦敦地铁员工中有 5.6% 为穆斯林, 公交司机中这一比例达 7.9%。这些岗位对城市日常运转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保障了基础服务的连续性。^③

穆斯林企业家为英国经济注入强劲动力。伦敦地区有 1.3 万家穆斯林企业, 创造超过 7 万个就业岗位, 占当地中小企业的 33%。^④ 从社区便利店到 EG 集团 (欧洲最大加油站运营商) 和 Bestway (英国第七大私营企业) 等商业巨头, 穆斯林资本在零售、物流、食品等领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根据平等智库 2023 年的报告, 英国穆斯林企业的年产值总计最高可达 247 亿英镑。这类企业多分布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通过供应链本地化有效激活了区域经济。^⑤ 此外, 英国穆斯林展现出超常的慈善参

① General Dental Council, "Registration Statistical Report 2023," https://www.gdc-uk.org/docs/default-source/registration/registration-reports/registration-statistical-report-2023-final-and-accessible-v2.pdf?sfvrsn=91957fe_3 (上网时间: 2025 年 4 月 13 日)。

② Health and Care Profession Council, "Diversity - data - Biomedical - Scientists - January - 2024," <https://www.hcpc-uk.org/globalassets/resources/data/2024/edi/bs/diversity-data-biomedical-scientists-january-2024.xlsx> (上网时间: 2025 年 4 月 13 日)。

③ Mohammed Sinan Siyech and Sofiah Laila Shah,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British Muslims to the UK's Growth and Prosperity, and the Risk of Exodus", *EQUI*, September, 2024, <https://equi.org.uk/wp-content/uploads/2024/09/Equi-Economic-Contribution-Report.pdf> (上网时间: 2025 年 4 月 14 日)。

④ The Standford, "London's Mecca rich: the Rise of the Muslim Multi-millionaires Splashing Their Cash", October 30, 2013, <https://www.standard.co.uk/lifestyle/london-life/london-mecca-rich-the-rise-of-the-muslim-multimillionaires-splashing-their-cash-8913153.html> (上网时间: 2025 年 4 月 14 日)。

⑤ Mohammed Sinan Siyech and Sofiah Laila Shah,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British Muslims to the UK's Growth and Prosperity, and the Risk of Exodus," p. 8.

与度,该群体每年捐赠逾 17.9 亿英镑。^①例如,2018 年仅在斋月期间,英国超 350 万的穆斯林几乎以每秒 46 英镑的速度向全球的慈善机构捐赠超 1.2 亿英镑。^②这种基于信仰的慈善行为不仅缓解了公共财政压力,更构建起族群互助的网络。与此同时,英国在伊斯兰金融和清真产业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伦敦掌控了欧洲 85% 的伊斯兰银行业务,对中东资本参与基建投资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英国清真产业涵盖食品、化妆品、服装等领域,价值超过 100 亿英镑。英国还是西方最受欢迎的穆斯林旅游目的地,相关消费每年能带来数十亿英镑的收入。^③

不过,尽管贡献卓著,英国穆斯林群体仍遭受经济活动排斥和意识形态污名化的严重压迫。英国 2021 年人口普查显示,穆斯林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仅 48.6%,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15 个百分点。全职工作中,穆斯林占比(19.8%)远低于全国均值(34.9%)。^④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穆斯林群体的经济参与度和职业层次显著滞后于英国整体水平,他们的收入最低、就业率最低、从事高技能职业的比例最小、担任管理职位的可能性最低、经济不活跃率最高且无资格证书的比

① Mohammed Sinan Siyech and Sofiah Laila Shah,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British Muslims to the UK's Growth and Prosperity, and the Risk of Exodus," p. 11.

② Saeed Kamali Dehghan, "'If We Don't Give, People Don't Eat': Yemen Focus of UK Ramadan Giving", *The Guardian*, April 15,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apr/15/if-we-dont-give-people-dont-eat-yemen-focus-of-uk-ramadan-giving> (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15 日)。

③ Mohammed Sinan Siyech and Sofiah Laila Shah,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British Muslims to the UK's Growth and Prosperity, and the Risk of Exodus," p. 13.

④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Diversity in the Labour Market, England and Wales: Census 2021", September 25, 2023, <https://www.ons.gov.uk/employmentandlabourmarket/peopleinwork/employmentandemployeetypes/articles/diversityinthelabourmarketenglandandwales/census2021> #: ~: text = Of%20adults%20aged%2016%20years%20and%20over%20as (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15 日)。

例最高。^① 同时，这两个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中只有 41.5% 的人拥有住房（包括贷款持有和全款持有），27.2% 的穆斯林居住在社会福利性住房中。对福利住房的依赖度高（整体人口仅有 17.1%）、私有住房持有率低（整体人口高达 62.8%）的现状凸显了该群体在资源获取与融入主流经济体系中的持续性障碍。^②

此外，民调显示，超 1/3 的英国人认为伊斯兰教与本国价值观冲突，视其为国家安全威胁。^③ 据反仇恨犯罪组织 Tell MAMA 数据显示，2024 年英国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案件激增至 5837 起，较上年增长 43%，创历史新高。其中，暴力袭击案件同比增长 73%，威胁行为案件更是飙升 328%。穆斯林女性成为主要受害者群体，超三成受害者因明显宗教着装或标识而遭受攻击。^④ 极右翼势力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大替代”阴谋论，煽动的针对穆斯林社区的敌视，以及发动的对清真寺的袭击破坏，都是当前英国穆斯林群体遭遇的制度性歧视，是其宗教身

①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Religion, Education and Work in England and Wales: February 2020”, February 26, 2020,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culturalidentity/religion/articles/religioneducationandworkinenglandandwales/february2020#economic-activity>（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16 日）。

②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Religion and Tenure of Household,” March 28, 2023, <https://www.ons.gov.uk/datasets/RM134/editions/2021/versions/1/filter-outputs/a3171dc1-9548-4b7b-b0ac-48ef1b3c5394#get-data>（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18 日）。

③ Frances Perraudin, “Third of Britons Believe Islam Threatens British Way of Life, Says Report”, *The Guardian*, February 17,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feb/17/third-of-britons-believe-islam-threatens-british-way-of-life-says-report>（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18 日）。

④ Neha Gohil, “Record Amount of Anti-Muslim Abuse Reported in UK Since 7 October attacks,” *The Guardian*, October 4,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24/oct/04/record-amount-of-anti-muslim-abuse-reported-in-uk-since-7-october-attacks>; Aamna Mohdin and Chris Osuh, “UK Islamophobic assaults surged by 73% in 2024, anti-hate crime charity reports,” *The Guardian*, February 19,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25/feb/19/uk-islamophobic-assaults-surged-by-73-in-2024-anti-hate-charity-reports>（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18 日）。

份在公共领域的危机。

（二）政治影响与制度反冲

作为全英增长最快的宗教群体，英国穆斯林族群的政治影响力近年实现大步跃升，其动力源于人口变迁、议题绑定与组织化动员。在 2024 年大选中，宗教议题的影响巨大。根据亨利·杰克逊协会的研究，穆斯林人口在 129 个关键摇摆选区占据最大少数族裔地位，尤其在保守党掌握的边缘选区中占比高达 55.6%。^① 这种人口分布让穆斯林选民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大选结果显示，在伯明翰、布莱克本等穆斯林聚居区，工党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穆斯林占比超 30% 的 21 个选区中，工党得票率暴跌 29 个百分点，超 30 万传统票仓流失。巴以冲突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英国穆斯林对巴以冲突的反应表现为强烈的道德关切与行动主义。他们广泛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视其为违反国际法的暴行，并通过大规模抗议、公开声明及向政府请愿等方式要求停火、解除封锁、承认巴勒斯坦国及停止对以军售。这种立场深深植根于人道主义诉求，超越了单纯的宗教认同。然而，表达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使他们在英国社会面临巨大阻力。由伊斯兰恐惧症引发的针对穆斯林群体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在此期间飙升 600%；^② 穆斯林医护工作者

① Camilla Turner, "Muslim Vote May be Decisive in Most Marginal Constituencies, Says Think Tank," *The Telegraph*, June 22, 2024, <https://www.telegraph.co.uk/politics/2024/06/22/muslim-vote-may-decisive-in-marginal-seats-says-think-tank/>; Christian Concern, "The influence of Islam on the election", June 27, 2024, <https://christianconcern.com/comment/the-influence-of-islam-on-the-election/>（上网时间：2025 年 4 月 20 日）。

② TRT Global, "UK Muslims Feel the Heat for Supporting Palestinians," November 21, 2023, <https://trt.global/world/article/15918588>（上网时间：2025 年 9 月 4 日）。

遭遇的职场歧视骤增；^① 学生因佩戴巴勒斯坦标志遭校方审问；^② 社区场所如牛津清真寺遭受暴力威胁。^③ 这种偏见、污名以及对人身安全的威胁，导致穆斯林群体普遍感到被孤立、恐惧和被边缘化。

巴以冲突的持续发酵显著冲击了英国工党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动摇了传统上支持工党的穆斯林选民群体。最新民调显示，仅有六成曾在2019年大选中支持工党的穆斯林选民愿意再次投票给该党，超过两成选民仍在犹豫。这一趋势在穆斯林人口集中的英格兰西北地区尤为明显，工党在此处的支持率已出现大幅下滑。^④ 穆斯林社群对工党在巴以问题上的模糊立场深感失望，认为其未能明确呼吁停火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导致政治信任急剧瓦解。

冲突议题同样加剧了工党内部的政治压力。尽管高层议员仍公开支持领袖斯塔默的立场，但党内已出现担忧声音，担心保守党借外交举措抢占道德制高点，如时任外交大臣的前首相卡梅伦率先呼吁实现可持续停火并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工党前排议员坦言，选民对斯塔默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的摇摆态度极为愤怒，虽未达到2024年11月的峰值，但已足以迫使工

① British Islamic Medical Association, "Silenced and Alone: Gaza Conflict's Toll on UK Muslim Healthcare Workers", March 18, 2024, <https://britishima.org/silenced-and-alone-gaza-conflicts-toll-on-uk-muslim-healthcare-workers/> (上网时间2025年9月4日)。

② 参见上引 TRT Global, "UK Muslims Feel the Heat for Supporting Palestinians," (上网时间: 2025年9月4日)。

③ 参见上引 TRT Global, "UK Muslims Feel the Heat for Supporting Palestinians," (上网时间: 2025年9月4日)。

④ Aletha Adu, "British Muslims Losing trust in Labour over Its Handling of Israel - Gaza War," *The Guardian*, February 5,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4/feb/05/british-muslims-losing-trust-in-labour-over-its-handling-of-israel-gaza-war> (上网时间: 2025年9月4日)。

党投入大量精力挽回民心。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巴以冲突正重塑英国穆斯林群体的政治认同与投票行为。^① 高达 85% 的穆斯林选民表示各党对此次冲突的立场将直接影响其投票选择，而工党作为该族群“天然选择”的认同度在三年内骤降 49 个百分点。^②

这种政治觉醒催生了新型选举生态。4 名独立议员依托“穆斯林投票”组织的支持成功突围，该组织不仅提出校园礼拜权、修订极端主义定义等宗教诉求，更在社交媒体扬言要“在 2025 年与工党开战”^③。其中，伦敦塔村区的政治生态堪称英国穆斯林政治本土化的典型案例。以孟加拉裔穆斯林为基本盘的 Aspire 党，通过清真寺网络动员、族裔媒体造势和宗教话语建构，在穆斯林占 40% 的选区建立起足够的影响力。例如，该党领袖拉赫曼虽曾因选举舞弊被禁公职，仍通过 101 位伊玛目联名签署的孟加拉语公开信、8 家孟加拉语电视台定向宣传等本土化策略，成功将宗教影响力转化为选票——他在孟加拉裔聚居区得票率高达 65%。这种“清真寺政治”模式突破了英国传统政党框架：公共资金向宗教关联机构倾斜（如 25 万英镑市政拨款流向清真寺背景的慈善组织），政策制定语言使用非英语语种

① Aletha Adu, “British Muslims Losing Trust in Labour over Its Handling of Israel – Gaza War,” *The Guardian*, February 5,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4/feb/05/british-muslims-losing-trust-in-labour-over-its-handling-of-israel-gaza-war> (上网时间: 2025 年 9 月 4 日)。

② Aletha Adu, “British Muslims Losing Trust in Labour over Its Handling of Israel – Gaza War,” *The Guardian*, February 5,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4/feb/05/british-muslims-losing-trust-in-labour-over-its-handling-of-israel-gaza-war> (上网时间: 2025 年 9 月 4 日)。

③ Mostafa Rachwani, “Muslim Vote Group Says it will Target Labor Ministers and Whip at Next Federal Election”, *The Guardian*, July 2,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article/2024/jul/02/muslim-vote-political-movement-candidates-labor-federal-election> (上网时间: 2025 年 4 月 20 日)。

来回避公众监督，甚至出现了“投拉赫曼拿免费餐食”的社区式选举交易。当主流政党在塔村区得票率不足10%时，这种以族裔宗教认同为核心的本土化权力结构，既折射出少数族裔政治赋权的深化，也暴露出世俗民主原则在多元文化主义下的治理困境。^①

当然，少数族群政治影响力的扩张势必会触发英国主流制度系统的调整与反冲。保守党内部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恐惧症成为压制力量的核心体现。2024年民调显示，58%的保守党成员认为伊斯兰教威胁英国生活方式，这一比例较2020年增长11个百分点，且两倍于全国平均水平。^②当副党鞭李·安德森公然宣称伦敦市市长萨迪克·汗被“伊斯兰主义者操控”时，前首相苏纳克仅对他处以撤销党籍的轻微处罚，党内高层更是集体拒绝将其言论定性为“伊斯兰恐惧症”。^③此外还有更多极端话语。前内政大臣布雷弗曼将民众对于保守党宗教立场的批评声浪斥为“歇斯底里”。^④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更是使用“邮筒”“银行劫匪”等污名比喻来形容穆斯林女性服饰。这一言

① Daniel Dieppe, “Political Islam is Already in Britain: Lutfur Rahman and the Case Study of Tower Hamlets,” *The Critic*, February 4, 2025, <https://thecritic.co.uk/political-islam-is-already-in-britain/> (上网时间: 2025年4月25日)。

② Kiran Stacey, “More than half of Tory Members in Poll Say Islam a Threat to British Way of Life,” *The Guardian*, February 28,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4/feb/28/more-than-half-of-tory-members-in-poll-say-islam-a-threat-to-british-way-of-life> (上网时间: 2025年4月25日)。

③ Michael Sheils McNamee, “Rishi Sunak Warns of Hatred in Politics after Lee Anderson Row,” *BBC News*, February 25, 2024,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68395642> (上网时间: 2025年4月20日)。

④ Amy Gibbons and Charles Hymas, “Tory Islamophobia Row is ‘hysteria’, Says Braverman,” *The Telegraph*, February 26, 2024,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24/02/26/suella-braverman-condemns-hysterical-row-about-islamophobia/> (上网时间: 2025年4月27日)。

论导致英国国内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在一周内激增 375%。^①

其实,保守党内始终存在制度性的穆斯林排斥,最具代表性的是保守党在党内进行的关于穆斯林歧视问题的独立调查。早在 2018 年,穆斯林委员会就呼吁进行独立调查。该组织列举了保守党议员鲍勃·布莱克曼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勾连、地方议员频发反穆斯林言论等案例,指出党内存在大量且频繁的穆斯林歧视事件。^②但是,该呼吁遭司法大臣戴维·高克以“证据不足”的理由搪塞忽视。^③后来,约翰逊政府迫于压力最终在 2019 年启动了调查,并在 2021 年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承认 2/3 的党内投诉都与反穆斯林事件相关,但保守党却坚称“不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④。该党更是动用党内立场极端的势力来进一步消解问题的严重性。内政大臣贾维德拒绝承认穆斯林委员会的代表性,^⑤评论家道格拉斯·默里甚至称“伊斯兰恐惧症”概念模糊且无法与反犹太主义类比,^⑥极右媒体人布兰登·

① Lizzie Dearden, “Islamophobic Incidents Rose 375% after Boris Johnson Compared Muslim Women to ‘letterboxes’, Figures Show”, *The Independent*, September 2, 2019,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boris-johnson-muslim-women-letterboxes-burqa-islamophobia-rise-a9088476.html> (上网时间: 2025 年 4 月 28 日)。

② BBC News, “MP Bob Blackman Defends Tapan Ghosh’s Appearance in Parliament”, October 27, 2017,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41765962> (上网时间: 2025 年 4 月 28 日)。

③ BBC News, “Theresa May’s ‘Head in Sand’ Over Tory Islamophobia, Says Warsi,” March 6, 2019,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47454993> (上网时间: 2025 年 4 月 30 日)。

④ BBC News, “PM’s Burka Comments Gave Impression of Insensitivity – report,” May 25, 2021,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57239483> (上网时间: 2025 年 5 月 2 日)。

⑤ The Times, “Sajid Javid Clashes with Muslim Council over Islamophobia,” June 4, 2018, <https://www.thetimes.com/uk/politics/article/sajid-javid-clashes-with-muslim-council-over-islamophobia-63rfs5878?region=global> (上网时间: 2025 年 5 月 2 日)。

⑥ The Spectator, “The False Equivalence between ‘Islamophobia’ and Anti-Semitism”, March 8, 2019, <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the-false-equivalence-between-islamophobia-and-anti-semitism-8-march-2019/> (上网时间: 2025 年 5 月 3 日)。

奥尼尔指控穆斯林委员会利用该议题转移工党的反犹太丑闻焦点。^①

这种来自政府层面的漠视，暴露了保守党在多元文化治理中的深层偏见。该党始终以工具化的态度对待宗教自由议题，他们既利用民粹话语来巩固基本盘，又拒绝正视系统性偏见对政治伦理的侵蚀。这种政治暴力与制度沉默的合流，本质上是对穆斯林政治赋权的压制。当穆斯林选民在关键选区迫使工党调整巴以政策、独立候选人借助宗教动员打破传统党派壁垒时，保守党坚决选择强化“伊斯兰威胁论”叙事，将移民管控与“捍卫基督教价值观”捆绑，试图以身份政治对冲少数族裔的政治崛起。

结 语

英国穆斯林族群的演进轨迹是宗教传统向现代性的转化。随着基督教影响力的下滑与世俗化浪潮的席卷，穆斯林群体正从边缘的移民族群转向英国宗教图景的核心参与者。这种转型并非简单的信仰人口的比例变化，而是深刻的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第三代年轻穆斯林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与思想观念创新，将伊斯兰元素与英伦文化进行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表达模式。这种文化生产既挑战了主流社会对伊斯兰的刻板想象，也重塑了群体内部的认同边界。在政治领域，穆斯林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政党议程，而是以巴勒斯坦议题为支点撬动选举地理，

^① Spiked, "No, Islamophobia is Not the New Anti-Semitism," June 6, 2018,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18/06/06/no-islamophobia-is-not-the-new-anti-semitism/> (上网时间：2025年5月3日)。

通过独立候选人与新型倡议组织争夺话语权。这种政治觉醒也伴随着价值观念的代际更替。当老一辈仍困守于族裔聚居区的文化堡垒时，新生代已在探索信仰原则与公民身份的兼容模式。这种内生性调适预示着一个更具弹性的信仰共同体正在成形。

然而，这种转型始终是在外部排斥与内部张力的夹缝中艰难推进。主流社会对伊斯兰的认知滞后于现实演变，政策层面仍深陷“安全化”的思维定式。穆斯林族群始终被简化为潜在风险源而非平等伙伴。英国穆斯林族群的未来发展将在守护宗教内核与拥抱公民身份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个过程既考验着主流社会的包容智慧，也取决于穆斯林知识分子能否建构出真正根植本土的伊斯兰现代性论述。

著（译）者简介

- 王 涛**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
- 龙兴春**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徐以骅**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 张 励**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 陈冬梅** 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李 晶**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哲学系暨东亚研究院副教授
- 陈 宇**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 王佳尼** 上海大学文学院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
- 马启峰**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 唐淑娴**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中南亚研究中心讲师
- 吴波汛** 河北师范大学晏梁学智中心助理研究员
- 姜 阳**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师资博士后
- 潘米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博雅博士后
- 刘庭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